

社會學取向的教科書政策分析

王麗雲 甄曉蘭

長久以來，教科書政策爭議不斷。鑑於教科書的重要性與教科書政策的關鍵影響，教科書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研究數量也不斷成長，但大部分的研究無論在主題或方法取向上，多以教科書的內容分析為主，少有對教科書政策進行分析者，而以社會學取向對教科書政策進行分析研究者更少。教科書所呈現的合法知識，往往是文化、社會、政治、經濟及教育勢力的角力結果，教科書議題極適合透過社會學的觀點來獲得進一步的理解，因此，本文特別探討社會學分析應用於教科書政策研究的可能途徑與潛在價值。文中首先介紹社會學取向分析的意義與功能，進而解析政策研究的功能與旨趣，並探討教科書政策研究的可能議題，最後，舉例說明教科書政策社會學分析的議題焦點與應用潛力。

關鍵詞：教科書政策、政策分析、社會學分析

收件：2009年4月3日；修改：2009年5月7日；接受：2009年5月8日

Sociology-Oriented Textbook Policy Analysis

Li-Yun Wang Hsiao-Lan Chen

Textbook policy has been subjected to fierce controversy over the last decade.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textbooks and the immense impact of textbook policy, more and more research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extbook controversy. However, most of the existing textbook related studies focus more on content analysis of textbooks. Only a few focus on textbook policy analysis. We rarely find studies on textbook policy analysi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ince the legitimized knowledge in textbooks is quite often the result of power struggles among cultural,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forces, it is critical to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extbook controversies through a sociological len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possible approaches and embedded values of sociology-oriented textbook policy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will first introduce the meanings and functions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The authors will then explore the potential themes for textbook policy analysis. Finally, examples of sociology-oriented textbook policy analysis are given to illustrate possible issues for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Keywords: textbook policy, policy analysis, sociological analysis

Received: April 3, 2009; Revised: May 7, 2009; Accepted: May 8, 2009

壹、前言

當教科書政策是要透過市場競爭機制，來提升教科書品質時，市場競爭是否就同等於品質競爭？而品質勝出者是否就必然能占有市場？在校務評鑑過程中，老師們針對學校教科書選用規準問題，給了這樣的答案：

「不能都只用一家或少數幾家的教科書，校長都告訴我們要換一換，各科各年級搭配一下，這樣學校才不會惹上麻煩。」

「我們每年都換教科書，一年換一本才會熟悉全部的教材呀！」

「用哪一本有差嗎？他們這幾家編的課本不都越來越像！」

另外，當教科書政策由統編本轉成審定本時，教科書是否得以鬆綁，變得多元了？在學校家長代表大會上，有家長舉手發言：

「社會科的內容可不可以多補充各國史地？一年級到四年級太簡單，五六年級太難，又都沒有外國史地的東西，學校是否可以補充外國史地教材，讓小孩有國際觀呀！」

教務主任則笑吟吟的站起來，清清喉嚨說：

「家長的用心我知道，不過家長可能也要站在小孩的角度來看，這些外國的東西是不會考的，不是年段能力指標內的東西，我們是不是不要去增加小孩的學習負擔呢？」

長久以來，教科書政策或左或右、或統一或開放，總是爭議不斷。或是政治產物，或是文化產物，或是經濟商品，教科書都反映出教育系統中的「合法知識」，同時具有文化、社會、政治及教育等不同的面貌，或有人指稱教科書既是文化精華的傳承媒介、促進社會團結認同的利器，又是維持階級利益的工具，更是師生教與學的溝通橋樑（鄭世仁，

1992)。但根據 Venezky (1992) 的分析，教科書是一種「準」課程，是課程鏈 (curriculum chain) 中的一環，屬於規範課程 (prescribed curriculum)，是需求課程 (needed curriculum) 和所欲課程 (desired curriculum) 的具體展現，換句話說，教科書是學校信念與意圖的明顯性展示 (visible manifestation of the school's beliefs and intentions)。無論如何，教科書是教育方案的核心，具體勾勒、實踐課程的目標與內涵，是教師教學的主要參照依據，學生學習的重要奠基要件，往往學校教育的內容和活動，絕大部分都是由教科書決定的。因此，教科書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動見觀瞻。也難怪教師、家長、學者或社會團體，對教科書內容常有意見，一旦有問題，便成為攻擊或批評的焦點，而當前的教科書開放政策，更是飽受各方的質疑與抨擊。

鑑於教科書的重要性、教科書政策的關鍵影響，近年來教科書研究猶如雨後春筍的蓬勃發展。然根據周珮儀和鄭明長 (2006) 的回顧分析，大部分教科書研究無論在研究主題方面或研究方法取向上，仍以教科書教材的內容分析為主，其他有關教科書的實徵研究，例如：編審制度的相關研究、選用制度的研究、評鑑規準建構的研究和市場機制的研究等，論文篇數並不算多。縱使教科書政策開放審定以來，諸如一綱多本、書價上揚、政治意識型態爭議、審定制度、書商壟斷、教科書選用等，各種有關選擇、效率、均等、品質的爭議不斷，但似乎很少教科書研究試圖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或在主題上從社會學分析角度來深入地探討教科書政策形塑和實施的議題，實有必要在研究議題積極開展新的向度，在方法論方面加強新的知能，或許能進一步提升研究品質，開創更具價值的教科書研究，對教科書政策的規劃與改進有更具體的回饋。基於此，本文企圖探討社會學分析應用於教科書政策研究的可能途徑與潛在價值。

貳、社會學取向分析的意義、功能

教科書政策的研究，可以由多種角度切入，例如政治學、經濟學等，本文則將分析的焦點集中在社會學層面。當然，社會學分析不見得能幫我們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可以幫助我們將問題看得更清楚，將現象背後的原因釐得更透澈，進而對相關政策議題作更周全的思考。

一、何謂社會學取向分析？

以社會學分析為關鍵字，查詢相關的著作，不難發現社會學分析的意義有二，一是指採取特定社會學理論觀點（Blackledge & Hunt, 1985），對社會現象進行分析或解釋，例如透過知識社會學角度分析科學知識的形成（Mulkay, 1992），或是以批判理論的觀點對教科書進行分析（Apple & Christian-Smith, 1991）。因為探究事物的角度不同，所問的問題與提出的解釋也就不同。社會學分析另一項意義則是指利用社會學研究方法進行分析，常見的社會學分析方法包括量化分析與質性分析。這兩種社會學分析方法與社會學理論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總結來說，只談方法不處理解釋或分析的角度，能幫助我們瞭解社會事實的貢獻，將會是有限的；而光有理論卻不蒐集實徵資料來瞭解實務的現況，恐怕也只是「腦爽」¹的工作，對於理論的修正與實務的改進，幫助其實不大。

二、理論取向的社會學分析

（一）理論取向社會學分析的功能與問題

社會學理論是什麼？簡單來說，它是對社會現象所提出的系統性解釋，這些系統性的解釋至少扮演了以下幾項功能，首先是讓我們瞭解社會現象，將社會現象意義化，例如我為什麼考不好？或為什麼他人比我有錢？或為什麼某些人可以活得比別人久？娶到比較漂亮的老婆？或

¹ 乃指只重思辨卻不檢視實徵證據結果，也不關心實徵證據與理論之間的差距。

養出比較好的孩子？

其次，如果系統化成功，或許我們還可以控制（預測）社會現象，就好比如果我們知道水龍頭關了，水就會止住一般，我們可以創造自己所希望看到的社會事實或社會條件，譬如告訴我的孩子要做哪些事或具備哪些條件，才能獲得比較高的薪水（或是讓別人的薪水相對變低），活得健康長久，或者乾脆改變人生目標，不作這些白日夢。

理論的第三個功能，則是幫助我們多長一雙眼睛，看到平常眼睛所看不到的社會力，如何影響到我們所存在的社會，因為有偉大社會學家的睿智分析，使我們能超越事物的表面現象，瞭解隱藏的社會力，如何形塑我們的生活和經驗。舉例來說，如果沒有 Apple（1979）的指引，大眾恐怕還認為智力測驗是客觀的，升學考試的上與不上是一種公平的社會分工機制，只是反映個人的努力與才智（王麗雲譯，2002）。

（二）主要社會學理論及其教科書政策研究旨趣

社會學理論的流派相當的多（可參照馬康莊，1985；Wallance & Wolf, 1991），無法在 1 篇文章中完整的介紹，本文擬以最主要的 3 派：結構功能論、詮釋學及衝突論為例，說明社會學的研究如何能有助於對教科書政策的分析，並藉之呈現教科書政策研究的可能途徑及探討議題。這麼做就排除了許多其他理論，例如符號互動論、現象學等理論的分析。不過，若能掌握這 3 個理論，其實已掌握社會學理論主要的形貌。

1. 結構功能論

結構功能論在國內無疑是被討論最少，但是最常被奉以實踐的理論，這派學者常常被冠上和諧理論學派（consensus theorists）（陳奎熹，1998），乃因這派學者多強調系統、整合、穩定、共識。Parsons 是這派學者中常被提及的代表人物，他也有一篇作品直接討論教育的功能。根據 Parsons（1959）的看法，學校教育其實扮演兩種功能，一是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功能，另一個是選擇（selection）的功能。學校的社會化功能，乃在讓個人成為社會中可以運作的一份子；學校的選擇功能，

則在根據學生的能力與性向，將學生分配到不同的位置上，這兩項功能都在教育的歷程中完成。影響個人社會成就的重要因素，乃是學生的能力（ability）與努力（effort），換句話說，具備能力與努力的學生，將佔據社會中的重要位置，獲得較為重要的社會資源，社會階層化也據此成形（Davis & Moore, 1945）。這也是功績主義（meritocracy）的重要假設。

根據結構功能論的看法，學校必然受到外在社會的影響，科技的革新或技術的進步，都會影響到教育的內容，學校教育亦必須不斷革新，以便培養能配合社會需求的人才（Collins, 1971）。而學校教科書應該扮演社會化和選擇的功能，在社會化的部分，教科書必須由眾多知識中挑選出最重要，最有價值的知識，傳遞給下一代，以達成學校教育社會化的功能，讓學生成為將來可以運作的社會成員（functional social members）。在選擇的部分，學校教科書則必須發揮性向試探與適性的功能，讓學生能根據自己的才能，在社會系統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

以現代社會來說，課程設計者對於核心能力與關鍵能力的關心，其實都反映出結構功能論的觀點，例如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所擬定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開宗明義便指出其核心的教育關懷，乃是思考「我們需要具備什麼樣的基本能力來應付未知？我們需要培養什麼樣的新觀念以創造未來？」「如何培育新觀念、新技術、新視野的個人，以加入新世紀的競爭與合作。」「為因應二十一世紀社會的特點與變遷方向，教育現代化更應配合主體性的追求，反映出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國際化的方向。」（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為將來社會作準備，配合現代化需求的概念以便引導之後的教育改革，當然也包括課程改革、教科書改革、教學改革。相關的綜合高中制度、多元入學方案等制度，也是因應這些目標所推動的改革方案。

顯明的例子如美國因為蘇俄 Sputnik 號升空帶來的國防緊張，使得他們推動一系列的課程改革，希望能透過課程改革提升國防能力，就是符應社會需求所進行的教科書改革實例。社會的需求常常引導學校教科

書的內容，如果大家認為認知能力是教育的重心，也是社會的需求，在教科書編排時，就會將重點放在知識內容的分析，並且將這些內容融入教科書中，以便為學生做好準備，使之具備適應現代生活所應具備的知識。如果認為非認知技能（如態度、價值觀、社交技能等）是教育的重心，也是社會的需求，在教科書的編排上，就會設法為學生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加強情意等方面的教育。

2. 詮釋學

詮釋學是一套意義詮釋的方法、理論或哲學，認為現實（reality）是透過人際間的溝通、辯證所建構出來的，極為尊重現象本身的常態性及特殊性，並且重視現象的整體性及其發展的情境脈絡。將之應用於教育研究，有助於理解教育現象背後的意義，掌握教育價值系統的互動關係及其社會文化脈絡（甄曉蘭，1996）。

由於近來政策理論的發展，逐漸聚焦於決策過程和政策實施的複雜性，更多關注到語言的意義、主體意識和詮釋的問題，不僅企圖瞭解政策的意圖，亦重視政策的影響，詮釋學的應用，不僅為政策分析提供新的視窗，更開啓了新的方法論的可能性。基本上，詮釋的、文化的政策分析，將政策視為豐富、複雜的信念系統，重視政策形塑及其實踐過程中的溝通形式與影響因素，亦即「聚焦於從立法到實施過程中的符號和語言，考驗政策中的敘說成分，即政策所依據的情節和爭論」（歐用生，2006：6）。根據歐用生的解說，其探討層面鎖定在：（1）政策過程反映的信念系統，社會問題和答案如何界定？誰界定？他們又代表誰？（2）政策產生的語言與儀式制度的習慣，誰是主流？誰是附屬？主流如何控制附屬以達成期望的改變？

詮釋學取向的政策分析，通常會著重與瞭解決策者、實務工作者、利益團體對政策的解釋，進而探討政策的形塑、生成、實施及後果（consequence）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多元意義，以便為政策目標的假定和政策結果的解釋，提供整全理解的資料。若轉化為對當前臺灣教育改

革政策之分析，或可更有效結合批判理論，進行所謂的批判詮釋學分析，將能更充分地理解當前課程改革政策、教科書政策是如何形塑產生的，其背後潛藏了怎樣的權力運作與利益角逐，以及學界、政客、媒體等是如何利用其優勢地位來進行知識的宣稱、意識型態的推銷，進而使其主張與訴求化為實際的政策。

針對課程內容進行詮釋學分析的研究較常見到，許多課程的內容分析就是初步的詮釋分析。相較之下，對於教科書政策的分析較少見到，但可以舉一些未來可進行的分析為例說明之。例如政府曾經大力推動的建構教學，在學者層級、學校層級、教師層級、家長層級等，究竟是如何詮釋與回應這樣的政策，又產生了那一些教育效果？又如英語教學政策，中央想達成的目標是什麼？地方如何詮釋、理解與回應這項政策？教師與家長的想法與「算盤」又是什麼？補教業的動作又如何影響上述人士對英語教學政策的詮釋？造成上述詮釋差異的原因是什麼？這些都是將來可以進行的教科書政策詮釋分析。

3.衝突論

衝突論在國內應該是耳熟能詳的理論，探討的學者多，新的流派也不斷被介紹（可參考譚光鼎、王麗雲，2006）。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下層結構）決定社會文化（上層結構），應用在教育上，便發展出對應論（correspondence theory）。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學者對於結構功能論的解釋不滿，認為結構功能論者忽略了社會中的衝突與競爭，以及資本主義對學校教育的影響（Apple, 1979）。

衝突論之後發展的流派相當的多，內部的修正也不少。最傳統的衝突理論批判教育學者當推 Bowles 與 Gintis，二氏認為學校中的社會關係反映出資本主義下的經濟關係，學校與學生被分化，培育出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下所需要的人力（包含失業者），而「能力」與「智商」則被用來合法化學校中的階級地位與關係（Bowles & Gintis, 1973, 1977）。Bowles 與 Gintis 的分析頗具啓示性，引導大眾注意教育與經濟實體之

間可能的關係，反思學校教育的真正功能，結構功能論所稱的功績社會其實可能是虛幻，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的利益，學校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工具，或是主宰階級合法化再製其社會地位的管道。

當然，符應論者的觀點也受到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的批評，認為其過度的簡化衝突與鬥爭的實際；過度強調再製，使學校無能成為生產改變的場所；過度強調經濟或階級單面向的因素，流於化約論，忽略了其他重要的面向（如文化）；也忽略了歷史分析（Giroux, 1983; Whitty, 1985）。因而有文化再製論與反抗論的修正。

文化再製論者關心學校文化如何被生產、選擇與合法化，是以與教科書與課程的研究關係密切。根據 Bourdieu（1986）的看法，我們之所以需要引進文化資本的概念，乃是基於以下的觀點：

- （1）不同的資本市場可以提供不同的機會與利益，經濟市場只是眾多市場之一。
- （2）所謂的人力資本可能是時間與文化資本投資後的成果，只以人力資本來看可能忽略的社會再製的重要面向。
- （3）經濟資本是一切文化資本的根本，其他經過轉換或隱藏的資本，其功效即在隱藏經濟資本作為根源的事實。
- （4）不同資本之間的轉換可能具有風險，越隱藏的資本也就越具有損耗性。不確定性也可能造成資本轉換的危機。
- （5）如果官方的、直接的特權受阻，資本的擁有者就有興趣訴諸隱藏的傳遞方式，確保稀有位置的獲得。

扼要的說，Bourdieu 認為文化資本只是經濟資本再製的合法工具，文化資本包括好的品味、特定知識、能力、語言型式等等，學校中所傳送的知識，事實上有利於特定階級，協助其子女獲得成功，再俟時機將文化資本轉換為經濟資本（Bourdieu, 1977）。

反抗論者則認為學校與個人具備相對自主性，所謂的直接再製其實過度化約了複雜的社會現象（Apple, 1982; Willis, 1981），如果由這個角度

來看，學校與學校中的個人是有機會改變經濟宰制的情況。

受到衝突理論（當然還有其他理論，特別是知識社會學、批判理論的研究）的影響，課程領域發展出再概念化學派，質疑傳統課程研究所本的科層模式與概念——經驗研究模式。再概念化學派的取向至少可分成3種，其中1種是社會——政治取向（Mazza, 1982），M. W. Apple 即是其中的領導人物之一，他的許多著作都處理教科書政策或內容的問題（Apple, 1979, 1986, 1993）。Apple 應用了批判社會學探究的取向，重新定義課程社會學探討的問題，他首先指出學校所傳遞的知識並非客觀或中立的，反而經常反映社會中的經濟、文化與政治力量（王麗雲譯，2002；Apple, 1979），他主張課程的探究應由「什麼知識為有價值」，改成「誰的知識最有價值」（Apple & Christian-Smith, 1991），更具體來說，Apple 為課程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包括了：

- （1）課程所呈現的是誰的知識？
- （2）課程的內容是誰來選擇的？
- （3）課程為什麼以這種方式來組織和施教？又為何只針對這特殊的群體？
- （4）是誰的文化資本被安置在學校中？
- （5）是以什麼觀點來解說經濟實體？是以誰的原則界定了社會正義？
- （6）特殊群體的文化為何又如何以客觀和事實的知識在學校中呈現？
- （7）官方的知識如何具體表現出社會中優勢利益的意識型態？
- （8）學校如何將這些限定且僅代表部分標準的認知合理化為不可懷疑的真理？
- （9）在文化機構中施教的知識是代表誰的利益？

Apple 用圖 1 來說明意識型態的生產面向，但也可以說明 Apple 研究課程社會學的規劃。經濟、文化與政治面向是課程與教科書所存在的

環境，而種族、階級與性別則是與上述面向交互運作的動力（如資本主義將父權關係納入其中）。在分析的方法上，Apple 則提出關連性分析（relational analysis），這個分析方法與社會學分析的關係密切（王麗雲，2006）。

關連性分析強調個人不是處於真空之中，而學校制度與教育實施亦然。因個人與教育都是處於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脈絡中，我們要分析學校事務（當然包含課程）的真實性，只有透過整體的觀點方能掌握（Apple, 1979）（參見圖 1）。然而，現今的許多教育研究（含課程與教科書研究）卻將具體的人化約成抽象的個人，將個人與其所在的大社會隔離，也就無法顯現出個人與他人的結構性關係。基本上，關連性分析的進行方式，首先是將研究的主題與其歷史根源產生關連，了解其是如何產生（例如教科書政策為何轉變？誰讓它轉變？這些人有何特徵？理由說辭為何？），其內在隱而不現的矛盾趨勢為何（例如教科書政策究竟是鬆綁或綁得更緊？教科書自由化政策是否已發揮市場功能，汰劣留強？或是有其他因素影響教科書的市場？），上述的分析方法，乃是強調將教育與其所存在的經濟、文化與政治產生關連，尋找學校現況的社會根。關連性分析強調我們不能只就事物明顯的特徵加以解釋，也應了解該事物與其他因子較不明顯的連結，Apple 認為成就主體，並賦予其意義，乃

	經濟	文化	政治
階級			
種族			
性別			

圖 1 Apple 社會學取向課程研究的興趣
資料來源：出自 Apple（1983: 25）。

爲其與其他事物的關連與關係，Apple 稱此爲置入的行動（act of situating）。我們可以由一個人視爲理所當然的事來了解一個人；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由社會中不受爭議，視爲理所當然的事來了解社會上最基本與重要之事，想了解特定歷史階段中人的活動，需先質問何者對他們而言是無可懷疑的，將這些活動置於經濟、意識型態、社會衝突之中，使潛藏的、習焉不察的政治、社會、倫理、經濟的興趣與職志顯現（王麗雲，2006：436-437；Apple, 1979）。例如教科書內容的納入或排除，究竟是反映了那一些政治、文化或經濟的興趣（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鄉土課程、歷史教材）？或是受到那些階級、種族或性別意識型態的影響？

在關連性分析中，Apple 特別強調歷史分析，因爲所有的制度或實施都只不過是歷程中的一部分，透過歷史分析，可以使我們對過去主宰的原則與歷程保持敏感，亦可以較正確地詮釋教育結構與社會變遷特定階段權力、經濟、控制結構之間的關連（王麗雲，2006：436-437；Apple, 1986）。Apple（1979）對測驗的分析可爲一例，在此不再贅述。

上述社會學理論，提供了我們觀察與解釋社會實體的觀點，藉由偉大社會學者及其理論的照明，我們能夠更深入的思考社會現象背後更深層的意義。不過社會學理論麻煩的地方在於同一現象，不同理論流派，社會學家所提出的解釋往往不同（廖立文譯，1986）。譬如我今天失業了，功能論者的解釋是我不具備勞動市場所需要的知識或技能，自然無法保住工作，只要我再進修，掌握新的知識與技能，就能夠再度就業；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可能認爲我是被資本家剝削的工人，我的命運完全是資本主義邏輯作祟的結果，改變我命運最好的方式是改變經濟實體（下層結構），進行革命，揚棄資本主義邏輯。這兩派理論要我們奮鬥的方向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到底該用哪一個角度看待我們失業的事實，採取哪一個流派所建議的行動？

三、理論取向與方法取向社會學分析的平衡

如前所述，社會學取向的教科書分析包含理論與方法兩部分，理論研究不是社會學研究的全部，方法也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部分。比方說，我的失業是何種因素造成的？可以透過研究得到部分的答案，或是進行更好的猜測（educated guess）。例如調查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們具備某些知識與技能的人的確比較不容易失業，獲得這些知識與技能就是我該努力的目標，因為功能論的功績主義在運作。但是當我們獲得這些知識技能，找到工作，開始上班時，卻發現我所努力學得的知識技能，和所從事的工作沒有太大關係（工作內容分析），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學習這些知識與技能的目的，只是把別人擠下去，讓我有工作，別人沒工作而已，我們就可以思考哪些社會力量造成了現在的結果（我的白努力與別人的失業），這時候 Marx 或 Collins（Collins, 1979）就在向我們招手了。我們工作有無，可能只是為了回應資本邏輯的需求，以協助其利益的極大化。

這就是實徵資料的功能，理論給我們指引，告訴我們在某些假設成立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可以看到哪些社會現象，接着我們去搜集資料，看看理論所預測的現象是否存在？同時也思考有沒有別的方式可以詮釋目前所看到的現象？如果沒有資料，理論的討論往往只能流於意識型態的爭辯，也就只能造福「象牙塔」裏的「學者」（還有政客），這就是方法取向社會學分析的功能。社會實徵研究的結果常常是令人不舒服的，因為研究發現有時會違反了一般人的常識判斷，得令很多人承認錯誤，吞下自己的話，所以發現社會事實的社會研究常成為眾人鳴鼓而攻之的對象（Bulmer, 1996）。但是砲火煙消雲散後，卻常常成為社會政策進展的重要動力。

要在本文中處理方法取向的社會學分析，乃是巴蛇吞象，野心過大，有些學者也未必會同意方法取向的社會學分析是社會學分析（如果其所處理的因子或變項與社會學無關，當然更不能稱為社會學分析），

不過實徵研究的確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特徵，實徵研究所處理的資料可以是量化資料，也可以是質性資料，至於資料搜集的方法，可以是調查，也可以是訪談，或是觀察、文件分析，至於分析的方法，可以是統計分析、內容分析等等。最近教科書的研究者也提出一些新的分析技術（Nicholls, 2003; Pingel, 1999），只不過這些技術不見得都具有社會學興趣，且何種作法最為適合，也是另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

參、政策研究的功能與旨趣

理想的政策研究，乃在根據確立的政策問題或目標，蒐集各種資訊（含研究資訊），研擬與比較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設計政策工具與推動方法，並蒐集回饋資訊以修正政策，藉以達成政策目標或解決政策問題。研究資訊只不過是多種政策資訊中的一環。社會學的研究資訊亦然，是以不應假設研究資訊與政策之間具備直線的關係，可以直接據以推動政策。

美國在 1950 年代以前，學校間的種族隔離情況嚴重，研究發現指出這些學校間的環境是不平等的，所以經過聯邦法院對 *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 的判決，確定「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政策是違憲的，於是推動反隔離（desegregation）政策，不料反而造成白人逃離的現象（white flight），形成更嚴重的種族隔離，讓都會區公立學校系統更雪上加霜，教育機會不均等的情況也越加嚴重（Bulmer, 1996; Mitchell, 1989），這便是教育社會學研究結果應用在政策上的限制。社會學或能描述某些現象，但當對某些社會問題的診斷變成政策後，卻可能造成更大的問題，讓問題的解決更為困難，政策研究就在探討政策場域中研究知識的內涵（社會學知識是其中 1 種）及其應用性，研究知識雖然正確，但應用在政策場域卻可能造成大災難（王麗雲，2006）。政策研究的功能就在讓我們不至於爲了改善黑人工人的薪資，反而造成更多黑人的失業（Chambers, 2000），讓我們的改革手段不會使我們離改革目標越來越

遠。看原因、看目標、看工具、也看結果，這是政策研究的重要功能。

社會學的資訊可以幫助我們擬定更有效能的資訊，因為這些政策的擬定，通常是為了實踐某些價值，這些核心的價值包括了均等（equality）、卓越（excellence）、選擇（choice）、效率（efficiency）（Stout, Tallerico & Scribner, 1994）。分開來看，這些政策價值都是值得追求的，不過當資源與時間有限時，進行政策決定卻往往面臨衝突，必須有所抉擇，抉擇的過程與抉擇的後果常產生政治與社會效應。以課程規劃為例，學生在校的時間有限，學校與家庭的資源也有限，進入學校的知識與活動必須受到挑選，根據那些原則來挑選，就變成重要的問題。表 1 即說明政策抉擇的困難，這個表格包括兩個面向，一是政策問題，二是政策價值。教育政策常關心的問題包括 5 大部分，包括了（1）誰應該上學？（2）學校教育的目的為何？（3）兒童該學習什麼？（4）誰應該決定學校方向與政策等問題？（5）誰應該為學校教育付費？如果比擬為教科書政策的問題，可以修正為（1）誰應該使用教科書？（2）學校教科書的目的為何？（3）學生應該學習怎樣的教科書內容？（4）誰應該決定教科書的方向與政策？（5）誰應該為學校教科書付費？4 個政策價值即均等、卓越、選擇、效率等 4 個政策價值內涵。這樣交叉分析的結果，或可提供思考教科書政策問題的架構。

表 1 政策問題與價值

	誰應該使用教科書？	學校教科書的目的為何？	學生應該學習怎樣的教科書內容？	誰應該決定教科書的方向與政策？	誰應該為學校教科書付費？
選擇					
效率					
均等					
品質與卓越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 Stout、Tallerico 及 Scribner（1994）自行改編整理而成。

例如誰應該上學，涉及到課程與教科書的服務對象，教科書的編輯應以誰為中心的使用者？如果認為為了確保國力，全國學生是教科書服務的對象（卓越），那麼一個全國性的、深化的課程就會是編輯的重心，美國在後史波鐵尼克（Post-Sputnik）後，聯邦政府介入課程編輯，推動全國性的課程改革即為一例（Tanner, 1999）。又以「誰應該決定學校方向與政策問題？」為例，如果追求的是卓越價值，可能認為由學科專家來決定教科書內容是最好的方式，因為他們對學科內容有最完整的掌握，如果重視選擇，則教科書政策應是開放的，由個別學校或教師自行決定，甚至不需要有教科書。若是重視均等，則教科書政策的決定者或許應該是教育專業人員，因為他們理應是學童的代言人與保護者（Gutmann, 1987）。

茲以表 1 中與課程和教科書最有明顯直接關係的問題：「學生應該學習怎樣的教科書內容？」為例，也會產生不同的教科書政策。如果是重視選擇價值，教科書的政策便會偏向自由化，尊重教師、家長與學生的選擇，也可以不要教科書。如果效率是主導的價值，標準化的教科書政策無疑是最省錢省事的選擇之一。如果強調均等，教科書的政策就會設法降低對不利學童（disadvantaged students）雪上加霜的影響。如果重視的是品質與卓越，教科書政策可能會比較重視「經典」、「學術導向」的內容取材。這些價值雖同時存在，但在某些社會情況下，特定價值會大行其道，影響課程與教科書政策的發展方向，例如擔心國力不振或經濟蕭條（Elliott, 1990），就會強調教科書內容的學術性與嚴謹性，以提升國力。

社會學研究對於教科書政策分析能幫上什麼忙？以誰應該決定教科書的方向與政策為例，政策研究可能關心價值問題，諸如：應該依循何種主要價值作為政策規劃的依據？又該安排誰來決定教科書的方向與政策？顯而易見地，不同價值取向、不同關鍵決策者，都有可能產出不同的政策決定。對社會學者而言，可以探討這些教科書決策者是在怎樣的社會脈絡（文化、政治、經濟）下產生的？具備哪一些特徵與經驗？

對教科書政策產生哪些影響？對不同的政策價值的倡導或傷害為何？

國內較少人從事教科書政策的分析與研究，或因不容易找到合適的題目，但現在經接二連三的課程改革政策推動之後，能夠進行教科書政策研究的主題則變得相當多，若以表 1 的架構來進行思考，將不難發展出如表 2 所列的各項關於教科書政策的研究主題，而在這些主題背後的核心關懷，則都是教科書政策所產生的社會效果。

舉例而言，最近因為教科書開放政策、M 型教育不均等現象、一綱一本或多本的爭議，使得教科書政策成為各方關心的焦點。若仔細觀察，大部分的討論都是由政治人物或社會大眾所發起，不但學界的研究很少被引用，而參與討論的學界人士也並不多（這也是另外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使得教科書政策的討論變成意識型態或經驗感想的爭辯。其實社會學分析可以對上述討論提供相當大的貢獻，可以促成掌握充分訊息的政策決定（informed decision making）。最簡單的運用方式，便是順着政策的邏輯去探討政策所預期的現象是否發生，再回過頭來探討政策設計是否有問題。例如一綱一本或一綱多本政策下，學生適性學習落

表 2 教科書政策可能的相關研究主題舉例

	誰應該使用教科書？	學校教科書的目的為何？	學生應該學習怎樣的教科書內容？	誰應該決定教科書的方向與政策？	誰應該為學校教科書付費？
選擇	教科書開放政策	家長參與不同取向教科書編輯方向（主智、兒童中心、探索、建構）	多樣分級課程顧客中心	市場化機制	市場化機制
效率	AB 版課程	教師安心課程（teacher proof curriculum）套裝課程AB 版課程	標準分化	市場化機制	市場化機制
均等	標準化課程	標準化課程補救教材	基本能力	教育專家	教科書經費補助
品質與卓越	國定課程	反映核心知識的課程	學科導向	學科專家	教科書經費補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實的程度是否不同？或是分析教科書的編輯者在編輯時，所設定的學生對象其多元程度如何（如果沒有，就不應該指望一本或多本可以促進適性學習）？而更深入的分析取向，則可以探討決策的社會脈絡，哪一些因素促成特定政策成為主流，或是探討支持與反對者的特徵，或是探討一綱一本與一綱多本的社會效果。這些發現對於檢討現行政策、決定未來政策方向，應該都會有所幫助。

肆、教科書政策社會學分析舉例

基於教科書所呈現的合法知識，往往是文化、社會、政治、經濟及教育勢力的角力結果，本文特別強調教科書議題極適合透過社會學的觀點來獲得進一步的理解，前述內容已分別從社會學取向分析的意義與功能、政策研究的功能與旨趣及教科書政策研究的可能議題等層面，來剖析社會學分析應用於教科書政策研究的可能途徑與潛在價值，下面則進一步呈現兩個分析案例，或許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思考教科書政策社會學分析切入焦點與應用潛力。

一、教科書開放政策的社會學分析：從回顧教科書開放政策之擺盪開始

教育政策的改弦更張，常反映大環境的脈動，交織著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影響因素。教科書政策的改變，自不例外。隨著 1987 年政治解嚴、1988 年解除報禁，在政治生態改變、社會結構重塑、校園民主覺醒的脈絡中，臺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日益蓬勃發展，衍生出一種所謂「民間訴求——政府回應」的態勢。各種反對教育威權、強調教育鬆綁、鼓勵多元開放的教改訴求不斷，而解除中小學教科書的管制、開放教科書市場、鼓勵民間業者參與教科書編輯、去除教科書不當的意識型態，亦是民間教改人士所積極倡議的重要訴求。

爲回應各方的教改呼籲，1988 年 2 月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中，便建議中小學教科書應考慮逐年開放審定制。次年（1989），教育部開始著手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並自該學年度開始採「統編」與「審定」並行彈性制度，陸續開放國民中小學藝能學科和活動類科教科書爲審定本，以因應各界對課程的批判和開放改革的要求。1990 年代初，民間教育改革力量愈益積極熱絡，對教科書全面開放的呼聲更是甚囂塵上，再加上立法院的積極運作，教育部在教改利益團體的壓力下，於 1995 年 2 月宣布，自 85 學年度開始，配合新修正發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之實施，國民小學教科書全面逐年開放爲審定本。然而，爲顧及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品質無虞、供書無缺、書價平準，國立編譯館仍繼續編輯國民小學國語、數學、自然、社會、道德與健康等 5 科教科用書，一併與民間業者編輯出版之教科書送審發行。然基於「編審分立」原則，教科書審查行政作業，則委由臺灣省國民教師研習會辦理。至於 86 學年度起逐年試用修訂、並自 87 學年度起正式使用之《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則仍採「統編」與「審定」並行，考科仍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輯，僅開放藝能學科和活動類教科書爲審定本。

基本上，教科書開放政策，或多或少象徵著「知識解嚴」與「教育自由化」，應該可以消彌統編版所形塑之一元化思想，促進課程內容的多元化和課程權力的重新調整，也可以藉由市場競爭機制，提升教科書的品質（周淑卿，2003）。然而，85 學年度首次全面開放國民小學教科書爲審定本的過程中，有關教科書的編輯、審定、試用、核價、選用等各執行環節，無不激起輿論激烈辯爭，或有言論直指：教科書驟然宣布開放，民間審定本的編輯作業，因時間不足、人力不夠，其版本內容仍充滿了「統編版」之色彩。

繼國民小學教科書開放審定之後，教育部復於 1998 年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教育改革行動方案」，進行國民教育階段之課程與教學革新，並於 2000 年 3 月修訂公布《國民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第一學習階段）暫行

綱要》。在新一波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脈絡下，教育部於 2000 年 6 月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規定九年一貫課程之教科書全面開放由民間業者編輯出版，相關審定工作事項則由國立編譯館辦理。至此，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市場進入完全由民間出版業者自由競爭的全面開放審定時期。然陸續所衍生的教科書問題，較之 1996 年國民小學教科書全面開放審定所產生的問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諸如一綱多本、教材銜接、內容錯誤、書價上揚、參考書形成聯合壟斷等問題，引發了社會上出現了不少恢復統編本的聲音，希冀九年一貫國民中小教科書業務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印，「以杜絕教科書開放民間版後因一綱多本加重學生家長經濟負擔、學生學習壓力等諸多亂象」。教科書全面開放審定實施才一年，2003 年教科書政策又突然轉向，教育部提出「部編本與民編本併行制」是最佳選擇，並恢復部編本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的教科書，2006 年教育部則又在立法院強大壓力下，進行全部教科書恢復部編本可行性的研究。

無可諱言地，教科書開放審定政策，乃是臺灣地區課程史上的大事，不僅啟動了課程自由化政策，相對的，也帶動了教科書自由化、市場化和商品化；不但加強了學校教育人員課程自主的需求，也加強對教科書選用、評鑑的需求；不僅深化了課程本土化議題的論爭，也擴及教科書意識型態的論爭；不但普遍帶來社會參與的擴大，更促動社會大眾投入對教科書的關注與討論（詹美華，2004）。然而，教科書及其產生，隱含著複雜的政經、文化脈絡。教科書由統編制逐漸開放走向全面審定制後，教科書所展現的，不僅是文化的產品，更是經濟的產品，換言之，教科書政策，不僅是文化政策，更是政治政策和經濟政策（歐用生，1997；Apple, 1993）。畢竟，教科書是國家課程政策的重要體現，教科書開放反映了課程改革的實質層面。面對解嚴以後臺灣課程改革的社會大環境脈絡，教科書開放政策下衍生了哪些具爭論性的議題？這些議題指涉的爭議性事件，是怎麼發生？怎麼發展？相關爭議事件的公共論述，又是怎

麼說？說什麼？反映出甚麼樣的社會脈絡的變遷？呈現出怎樣的政治、文化、經濟的價值轉換與流動？這些都有必要從社會學取向的教科書政策分析，來做進一步的理解與澄清。

二、教科書開放政策的社會學分析：以教科書的出版為例

教科書開放政策使教科書擺脫了標準化的框架，不過若要因此假設教科書就中立、客觀，不受任何國家或社會力量控制，恐怕過於樂觀（Apple, 1991a），只要有了教科書，就會面臨知識建構的問題（Issitt, 2004），教科書就不會只是「什麼知識最有價值？」的問題，還包括了「誰的知識最有價值？」。教科書建立了教學和學習的物質條件，並且界定了何者是所要傳遞的合法和菁英文化，是以教科書的相關研究就格外重要（Apple, 1986）。對於教科書內容的社會學分析著作相當的多，分析的主題包括教科書內容中的種族、性別或階級意識型態（Anyon, 1979; Apple, 1993; Chen, 2002; Su, 2007; Temple, 2005），或是影響教科書編輯與選用的因素分析（Kieth, 1991; Venezky, 1992），以下將選取與教科書開放政策息息相關的教科書出版（textbook publishing）為例，將其置入經濟、文化與政治脈絡中，說明可以如何進行社會取向的教科書政策分析。

教科書開放政策推行後，政府只負責教科書的審查工作，教科書的出版則由民間出版業者負責，選用的工作則多交由學校處理，不論任何一個環節，或不同環節之間的關係，其實都是頗值得研究的題目。以此處探討的教科書出版為例，就是一個與文化、政治與經濟密切關連的教育現象。

教科書的出版，其實非常難自外於其所處社會脈絡的影響（Apple & Weis, 1983; Apple, 1986）。教科書出版的首要原則就是獲利，如果不能維持一定的利潤，出版業者也就沒有存在的可能。維持獲利的途徑包括降低成本，擴大市場，以提升利潤，在此情況下，透過嚴謹研究（或甚至

引用學術研究成果或理論)作為課程發展的依據,便成為相當昂貴的投資。再就擴大市場而言,以美國為例,教科書開放政策後,躋身州的教科書採用名單便成為必爭的場域,在這種情況下,教科書業者莫不根據州政府的價值觀出版「安全」的教科書,能獲得越多州的採認越好,舉例來說,有一陣子教科書若沒有將家長參與的概念融入教材的編輯中,就無法成為加州的教科書採用名單。為了擴大教科書市場的佔有率,業者莫不卯足了勁行銷,著名物理學家費曼先生(Richard Feynman)曾為加州政府選取教科書的經驗,提及業者檯面下的動作,就說明了教科書市場的競爭性與商業性(吳程遠譯,2007)。

自從出版也成為一項企業之後,書成為貨品,不論肩負學術或人文的任務,都得面臨利潤的問題,書本的生產,起自於找到足夠的資本,接著尋找一些能夠滿足顧客的題材印行,終之以能忍受競爭的價格出售(王麗雲,1990; Apple, 1986),教科書亦是出版業的商品之一,同樣受到經濟興趣的引導(簡單來說,經濟是底線),教科書的出版就特別留意相關政治、文化、性別、種族影響力,避免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而使得市場受阻(Apple, 1986, 1991b)。以政治因素而言,十九世紀美國 McGuffey Readers 就不提林肯與南北戰爭的議題,蓋提茲堡演說(Gettsburge address)也由課本中移出,以免失去南部的市場(Venezky, 1992)。當下的政治氛圍,影響了教科書的編輯。業者清楚地瞭解到課程是不同意識型態鬥爭的場所,這些衝突常使得出版業者無所適從,既然贏的位置欠明朗,出版業者也不會貿然加進任何材料(Apple, 1986, 1991b)。

另外,根據 Apple (1986) 的分析,教科書的編輯與採用,通常是由具特定特徵與經驗的人所決定,這些人通常是男性,過去銷售績效良好,才有可能負責教科書編輯工作,所以看重的自然是利潤,至於女性在出版界則多擔任薪水低、升遷少、可替換、與出版政策及目標較無關係的工作,自然對教科書出版政策產生不了太大的影響,這些編輯所反映出來的教科書政策,常常是男性為主的觀點。

上述對教科書出版業的分析當然不是認為出版業及工作其中的編輯完全不具自主性，純受經濟政治與文化力量的影響，不戀棧自身的技藝需求（如編出具有理想的教科書），但是社會中種種性別、階級、種族的歷史關係，以及出版業實際所面臨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也真確地限制了他們能做的決定（Apple, 1986, 1991b）。

伍、結語

不同社會學流派因其關心社會現象與層級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理論，如關心組織與制度所產生的新制度論，或是關心社會中個人行動所產生的理性選擇論等等。各種社會學理論不斷地推陳出新，這些理論也都能不斷地拓展我們的視野、擴展我們的認知。閱讀相關著作，有助於我們對社會學分析的敏感度與能力。國內學者對於引進新的社會學理論一直不遺餘力，如果要強化社會學分析的敏感度，我們對於這些社會學理論應該要多方學習，好讓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僅能看得更遠、看得更廣，也能思考得更深、思考得更透。

但是，當我們企圖借用社會學分析方法系統性地分析教科書問題、改進教科書政策時，我們絕對不能只戴一副眼鏡來看現象世界，或只用一套工具來處理所有的問題。針對特定的政策問題或現象，若只套用一個理論進行分析，未對理論作反省，也不去思考另類的解釋可能，這樣的作法，所運用的理論或方法，往往很容易就變成一種意識型態，不但對於所要探討的問題幫助不大，而且對於理論的進展也不利。

基本上，方法取向社會學探究的可貴之處，在於「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重視蒐集資料，並根據資料將其系統化與意義化。採行社會學取向政策分析時，若只停留在理論層次的探討，未能多跨一步進行系統化資料的蒐集以瞭解政策現象，研究就很可能流於一種自我服務的工作（self-serving），對公共利益（public good）並不會有太大的

助益。若能將理論與實務進行交互檢視與辯證，其實理論與資料的力量都可以是很強大、有影響力的，例如 Coleman 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的影響，或是 Alexander 與 Entwisle 對夏季失落的研究，將不同理論對教育現象的解釋拉得更近，就是很好的例證。

另外，進行社會學取向政策分析時，必須謹記所處理的只是幾個分析面向之一、二，任何研究的結果都不能單獨決定政策的走向，主要的原因是政策場域的複雜性，以及政策目標的多元性。應用社會學觀點進行政策分析研究，當然可以提供寶貴的資訊作為決策的參考，不過要全面指引教育政策的制定恐怕仍有其限制。以一綱一本或一綱多本的爭議來說，社會學取向探究可以分析政策起因、政策的社會效果，不過這背後研究分析者還需關心政策目標、政策價值、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政策成本，政治因素，社會氛圍等現象，方能綜合多方面的考量，產生較完整的理解，提出較周全的政策建言。畢竟，社會學理論不能與政策實務疏離，社會學取向的分析必須連結到真實情境中的政策實務問題，方能在交互辯證反省的關係與過程中，彼此相生相衍、互惠互濟。透過社會學取向的政策分析研究，若能提出高品質的實徵資料、創新的思考觀點，甚至提供可能的政策選項，當然也就有機會對教科書政策的走向產生實質的影響。

參考文獻

- 王麗雲（1990），艾波教育思想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王麗雲（譯）（2002）。M. W. Apple 著。意識型態與課程（Ideology and curriculum）。臺北縣：桂冠圖書。
- 王麗雲（2005）。艾波的課程思想。載於黃政傑（主編），課程思想（頁 173-204）。臺北縣：冠學文化。
- 王麗雲（2006）。M. W. Apple：批判教育社會學先驅。載於譚光鼎、王麗雲（主編），教育社會學：人物與思想（頁 425-448）。臺北市：高等教育。

- 王麗雲 (2006)。教育研究應用：教育研究、政策與實務的銜接。臺北市：心理。
-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6)。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2007 年 11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sinica.edu.tw/info/edu-reform/farea2/tsy-all_2.html#1
- 吳程遠 (譯) (2007)。R. Feynman 著。別鬧了，費曼先生 (Surely you are joking, Mr. Feynman!)。臺北市：天下文化。
- 周淑卿 (2003)。今是昨非，抑或昨是今非？教科書一綱多本爭議之分析。國立編譯館館刊，31，12-21。
- 周珮儀、鄭明長 (2006)。一個我國教科書研究資料庫的建置與分析。教育學刊，26，109-132。
- 馬康莊 (譯) (1985)。J. H. Turner 著。社會學理論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臺北縣：桂冠圖書。
- 陳奎熹 (1998)。教育社會學的發展與主要理論。載於陳奎熹 (主編)，現代教育社會學 (頁 179-206)。臺北市：師大書苑。
- 詹美華 (2004)。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教科書開放主要議題之論述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廖立文 (譯) (1986)。I. Craib 著。當代社會理論 (Modern social theory: From Parsons to Habermas)。臺北縣：桂冠圖書。
- 甄曉蘭 (1996)。從典範轉移的再思論質的研究崛起的意義。國立嘉義師院學報，10，119-146。
- 歐用生 (1997)。教科書事件平議。國民教育，37 (3)，3-10。
- 歐用生 (2006)。臺灣教科書政策的批判論述分析。當代教育研究，24 (2)，1-16。
- 譚光鼎、王麗雲 (主編) (2006)。教育社會學：人物與思想。臺北市：高等教育。
- Anyon, J. (1979). Ideology and United States history textbook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9(3), 361-386.
- Apple, M. W. (1979).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London: RKP.
- Apple, M. W. (1982). *Education and power*. London: RKP.
- Apple, M. W., & Weis, L. (1983).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Apple, M. W. (1986). *Teachers and text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lass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education*. London: RKP.
- Apple, M. W., & Christian-Smith, L. K. (1991). *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 New York: Routledge.
- Apple, M. W. (1991a). Regulating the text: The socio-historical roots of state control. In P. G. Altbach, G. P. Kelly, H. G. Petrie, & L. Weis (Eds.),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pp. 7-26).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Apple, M. W. (1991b). The culture and commerce of the textbook. In M. W. Apple & L. K. Christian-Smith (Eds.), *The culture and commerce of the textbook* (pp. 22-40). New York: Routledge.
- Apple, M. W. (1993). *Official knowledge: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ve age*. New York: Routledge.
- Blackledge, D., & Hunt, B. (1985).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educ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ourdieu, P., & Passeron, J.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owles, S., & Gintis, H. (1973). IQ in the U.S. class structure. *Social Policy*, 3, 65-96.
- Bowles, S., & Gintis, H. (1977).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Bulmer, M. (1996). The soci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social policy research. In J. Clark (Ed.), *James S. Coleman* (pp. 103-119).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Chambers, D. E. (2000).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programs: A method for the practical public policy analyst*. New York: Macmillan.
- Chen, J. J. (2002). Reforming textbooks, reshaping school knowledge: Taiwan's textbook deregulation in the 1990s. *Pedagogy, Culture, and Society*, 10(1), 39-72.
- Collins, R. (1971).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1002-1019.
- Collins, R.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Davis, K., & Moore, W. E. (1945).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242-249.
- Elliott, D. L. (1990). Textbooks and the curriculum in the postwar era, 1950-1980. In D. L. Elliott & A. Woodward (Eds.), *Textbooks and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42-55). Chicago: NSSE.
- Giroux, H. A. (1983).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 South Hadley, MA: Bergin and Garvey.
- Gutmann, A. (1987). *Democratic education*. Princeton, NJ: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ssitt, J. (2004).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textbooks. *History of Education*, 33(6), 683-696.
- Kieth, S. (1991). The determinants of textbook content. In P. G. Altbach, G.P. Kelly, H. G. Petrie & L. Weis (Eds.),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Politics, policy and pedagogy* (pp. 43-60).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azza, K. A. (1982). Reconceptual inquiry as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Curriculum Theorizing*, 4, 5-89.
- Mitchell, D. (1989). Education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Past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4(5), 153-167.
- Mulkay, M. (1992).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Gregg Revivals.
- Nicholls, J. (2003). Methods in school textbook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

- torical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3(2), 1-17.
- Parsons, T. (1959). The school class as a social system: Some of its functions in American societ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9, 297-318.
- Pingel, F. (1999). *UNESCO guidebook on textbook research and textbook revision*. Paris: UNESCO.
- Stout, R. T., Tallerico, M., & Scribner, K. P. (1994). Values: The 'what' of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In J. D. Scribner & D. H. Layton (Eds.),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politics* (pp.5-20). Washington, DC: The Falmer Press.
- Su, Y. C. (2007). 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aiwan's history: An analysis of elementary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1978-1995. *Curriculum Inquiry*, 37(3), 205-237.
- Tanner, D. (1999). The textbook controversies. In M. J. Early & K. J. Rehage (Eds.), *Issues in curriculum: A selection of chapter form past NSSE yearbooks. Ninetyeigh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pp. 115-14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emple, J. R. (2005).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you': Heterosexism in Quebec high school textbooks. *Canad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8(3), 271-294.
- Wallance, R. A., & Wolf, A. (1991).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Continuing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 Whitty, G. (1985). *Sociology and school knowledge*. London: Methuen.
- Willis, P. (1981).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Venezky, R. L. (1992). Textbooks in school and society. In P. W. Jackson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urriculum* (pp. 436-461). New York: Macmillan.